

革誰的命？

——日治臺灣文人李逸濤對革命思潮的接受
與其革命觀

林 以 衡^{*}

摘 要

革命，是震撼二十世紀東亞諸國的詞彙。無論是晚清中國或是維新成功的日本，皆受到「革命」觀念的影響，開創了新世代。而身處於兩大政體間的臺灣，也面臨「革命」的衝擊，影響臺灣知識分子開始建構自己理想中的「革命」，「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李逸濤，正是對「革命」有諸多思考的代表人士。

本文由李逸濤與晚清革命人物如孫中山、陳少白和章太炎等人的交遊論起，探究李氏的「革命」觀從何而來，並由此了解晚清時期中國人士與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的互動往來。而後，由李氏的文章或小說觀之，可見李氏對「革命」的嚮往與反清、反專制的壯志。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李氏的「革命」觀在種族議題上充滿矛盾，表現出

* 作者現任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政治認同上的無奈，以及因乙未割臺對腐敗清廷的痛恨，仍留於心中難以磨滅。

關鍵詞：李逸濤、革命、殖民、臺灣、專制

Revolutionize Who?

The Acceptance and the Viewpoints of “Revolution” in
Li Yi-Tao’s Thought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n Yi-heng

Abstract

“Revolution” is a prevailing concep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astern Asia. Man of high aspiration affected by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no exception. Therefor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began to create their ideal “revolution”. Among them, Li Yi-Tao, reporter from Taiwan Daily News,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ose having in-depth thought of “revolu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 Yi-Tao, Chen Shao-Bai and Zhang Tai-Yan, and discovers the inner source of Li’s concept of “revolution”. Besides, it could display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 China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rough Li’s articles and fictions, we find that Li admired “revolution” and opposed Qing dynasty as an autocracy. However, Li’s concept of “revolution” was filled with paradox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ut also the emerging hostility toward Qing dynasty for abandoning Taiwan after First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Li Yi-Tao, revolution, colonization, Taiwan, autocracy

革誰的命？

——日治臺灣文人李逸濤對革命思潮的接受
與其革命觀*

林 以 衡

前言

革命 (revolution)，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不容忽視的詞彙，若按照西方對「革命」的解釋，它暗含「改革」、「改變」和「變幻」等意思。¹“revolution”一詞，因為和“revolt”非常相似，兩個詞的意義後來也從「循環運動」轉變成為「起義」、「叛亂」。在「法國大革命」後，它的意義更轉化成為「必要的革新」、「建立新秩序」，在社會運動上則帶有「創建社會新秩序」之意。²也就是說，當愈來愈多人認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9年3月14日由政治大學中文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承蒙特約討論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講評外，亦蒙政大中文系鄭文惠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陳建華教授提供不少高見，令筆者收穫良多。近幾年屢經修改後，拙文又經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指正與建議，增補、修正不少過去未思考到的問題，在此一併致謝。

¹ 黃文儀主編：《牛津當代大辭典》（臺北：旺文社，1988年），頁1573。

²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412、415。

爲：「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的時候，「革命」因爲帶有暴力的因子，它和政治、戰爭的關係似乎也就更加的緊密，雖然世界歷史上不乏沒有以暴力、武力爲手段而達成的「革命」，例如人們所熟知的英國「光榮革命」、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等，但大多數在歷史上被定名爲「革命」的，例如「湯武革命」、「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等，皆難以擺脫暴力或是武力的色彩，無論如何，「革命」一詞最基本意義，仍是以「改革」、「改變」爲最大的訴求，只是在如何實踐並進而達到目的的過程當中，往往不得不採取較爲激烈的手段以達成最大訴求。

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革命時代，位在亞洲的中國同樣被捲入這個世界潮流之中。時值滿清末年的中國，國勢積弱不振，對內民變頻傳，對外列強進逼。西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慘敗的清廷不但要面對「自強運動」失敗的苦果，在「馬關條約」中被迫割讓臺灣的無能，更激起國內知識分子對清廷的不滿，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運動開始在中國各地掀起起義之火，並在「立憲運動」失敗後，中國有志之士對於「革命」的決心更爲強烈。這些革命運動，成爲晚清作家筆下的小說題材，阿英（1900-1977）在《晚清小說史》中就指出：

晚清小說活動中之最激流最進步的洪流，爲伴著民族革命運動而起的「種族革命小說」。這些小說，是以宣傳革命思想，鼓動革命情緒，使人民同情、參加，以完成中國的種族革命爲任務。³

除了中國展開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外，亞洲其他地區例如越南、俄國等也紛紛吹起革命號角。在此世界潮流下，臺灣雖然面臨從中國到日本政權交替的過渡期，也不能不被這股革命思潮所影響。日治

³ 阿英：《晚清小說史》（臺北：天宇出版社，1988年），頁89。

初期臺灣以漢文書寫，規模最大的官方報紙《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就不時地報導對岸「清國」所進行的「立憲」和「革命」運動，在這股風氣下，身兼傳統文人身分和「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的李逸濤（1897-1921），開始藉由一連串有關「革命」的文章、小說中發表他對於中國、越南革命的看法。

李逸濤，原名書，逸濤是他的字，又號亦陶、逸濤山人，臺灣臺北人。黃美娥、呂淳鈺在相關的研究中，對他的生平、交遊和文學成就，已有過開創性的論述。⁴林以衡則在碩士論文中，論述李氏的武俠文學時，注意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對於俠客的嚮往，和晚清的尚俠風氣可以聯結討論，這些都是觀察李氏接觸到「革命」的線索。⁵綜觀上述研究成果，證明李逸濤是日治初期臺灣文壇中極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人物，而由文學衍生探討，亦可深入論述其思想生成，以深化李逸濤的研究。因此，探討李逸濤在這股革命思潮的影響下，對於「革命」一詞具有什麼樣的認識，對日治臺灣的觀念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⁶本文將探討李氏如何透過「記者」和「文人」的雙重身分，接受「革命」這個世界性的產物，或是藉由報章雜文和小說的書寫，

⁴ 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⁵ 晚清尚俠之風，與革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李氏在文學中體現此「尚俠」精神，實可引申探討其革命觀。可參考陳儀蓉：《晚清革命黨人的尚俠精神與實踐》（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40-145。

⁶ 過去對於「革命」的研究極多，但多集中在對中國「革命」的探討，關於臺灣「革命」的論述則不足。目前關於「革命」的研究，以陳建華的研究最為完備，例如其專著：《「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以及對王韜、孫文和梁啟超的「革命」觀作出探討和比較，陳建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235-260。

來描述未曾在臺灣發生的革命運動、並表述其「革命」觀。而在探究李氏一連串對於「革命」的見解後，本文更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李逸濤到底是爲了哪個民族、哪個國家提倡革命，他到底是想要「革誰的命？」以上，將是本文爬梳相關資料和參考前人研究後，所要論述的問題。

一、李逸濤「革命」思想的來源

當清朝末年的中國持續進行革命運動的同時，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並沒有因此完全置身於革命浪潮外，有志推動革命者陸續來臺，在日治臺灣進行較爲自由的革命運動。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孫中山（1866-1925）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在興中會創立之初的1897年，孫中山即派陳少白（1869-1934）前來臺灣尋求幫助。當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同情中國革命，所以孫中山將臺灣視爲革命運動的另一地點。⁷先派陳少白來臺後，孫中山自己也在明治33年（1900）時親自到臺灣會晤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進行革命起義的後援活動。⁸

那麼，同樣是活躍於日治初期的臺灣文人李逸濤，有沒有可能受到孫中山陳少白等人革命思想影響呢？檢視目前可見的史料，並沒有李氏和孫中山等人直接交往的記錄，但從李逸濤的記者身分、活動參與和陳少白等人在臺灣的活動相比較，可以推測出李逸濤對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應當是有所認識。首先，陳少白與李逸濤有一個共同來

⁷ 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殖民政府對號召革命者如孫中山、陳少白頗爲友善，而孫中山認爲臺灣鄰近中國大陸，若舉事，由臺灣對大陸進行接濟和內渡均方便。可惜惠州起義時，日本內閣改組，對中國革命態度丕變，連帶影響鄭士良等人的起義失利。蔣子駿：《國民革命與臺灣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56-58。秦孝儀：《國民革命與臺灣》（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年），頁9-10。

⁸ 鄭淑蓮：《國民革命與臺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57-59。

往的群體，那就是日本來臺的官紳文人，楊永彬指出：

日治領有臺灣初期漢詩興盛，此與日本來臺的日本官員有關，這批官員多擁有深厚的漢學素養，善於漢詩文寫作，經常又能寫得一手好書法；亦即具有中國慣稱為「儒」（或儒官）的教養。⁹

對於日治初期的臺灣文人來說，中國的文化、教育無疑是他們感到最為親切和熟悉的對象；雅好風雅的日本來臺官紳亦是漢詩文的佼佼者，¹⁰雙方即藉由此共同嗜好展開交流，更別說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等人設立諸如「饗老典」、「揚文會」等活動對臺灣知識分子進行安撫。黃美娥即指出李逸濤曾參與「玉山吟社」活動，與日人來往甚密，而「玉山吟社」正是以日本來臺官紳文人和臺灣當地文人為共同主體的社團。¹¹明治30年（1897年），陳少白奉孫中山之命來到臺灣進行革命活動，¹²藉由與任職於《臺灣新報》的日本總編輯服部相善，服部因此介紹不少日本文人給陳少白認識，雙方並時常有詩文上的往來。¹³早在陳少白來臺的前一年明治29年（1896），李逸濤已進入「臺灣新報社」任職記者，¹⁴李氏自然也與服部認識。之後，《臺灣新報》上陸續報導了孫中山領導興中會革命的情況。¹⁵來

⁹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年），頁110-111。

¹⁰ 此現象可參考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1-32。

¹¹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243。

¹² 佚名：〈清士東航〉，《臺灣新報》第1版，1897年10月3日。

¹³ 鄭淑蓮：《國民革命與臺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頁27。

¹⁴ 李逸濤：〈弔峰蓮先生〉（上），《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8月9日。

¹⁵ 〈逆黨披猖〉，《臺灣新報》第1版，1897年9月28日。

到臺灣後，陳少白也有部分描寫臺灣的詩作刊登，¹⁶ 那麼以記者身分任職於此份報紙的李逸濤，必定閱讀過這些報導，特別是兩人的作品，還有共同刊在同一個版面過。¹⁷ 所以，兩人是認識的。李逸濤並在政治評論性質的文章〈革命之半面相〉提到陳少白，他說：

粵之陳少白，翩翩少年，多才多藝，非所謂革命中之上上人物乎？非于戊戌變政以前，即為孫逸仙麾下之健將乎？¹⁸

文中對於陳少白多所讚美，李逸濤與陳少白兩人間，存在著沒有直接見於書面紀載的友誼，且並非僅僅是點頭之交而已。

但直接影響到李逸濤對中國革命有所認識的人物，則是中國的革命要角章炳麟（1869-1936）。章炳麟，別名太炎、枚叔，浙江餘杭人，太炎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時局，對於清末的腐敗常有言辭嚴厲的批判，著作如〈儒俠〉、〈復仇是非論〉、〈國家論〉、〈五無論〉等，¹⁹ 努力將「俠」提升至為國為民的正面形象，認為在亂世之中只有充滿正義、入世精神的「俠」，能夠在武力的支持下，為中國開出一個新局，王樾論述章太炎的尚俠精神後讚美章太炎：

透過他對俠特殊的歷史詮釋，使我們深刻地發現並體會出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的歷史處境中所激蕩出一種自覺和自期……，為自己在現實中的作為賦予正面肯定、提升價值的依據，更可喚起志同道合者的奮鬥。²⁰

¹⁶ 例如〈初到臺偶作〉、〈吊劉撫〉、〈詠臺北城〉、〈詠基隆港〉等，《臺灣新報》第1版，1897年10月2日。

¹⁷ 陳少白：〈弔澎湖島〉、〈安平泊〉等書寫臺灣風景的詩作，李逸濤則有紀念其師的文章〈邱亦芝小傳〉，兩人中間只隔了館森鴻的詩作〈親鐙餘影〉，《臺灣新報》第1版，1897年12月3日。

¹⁸ 逸：〈革命之半面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7月7日。

¹⁹ 分別見於章炳麟（太炎）：《檢論》（臺北：廣文出版社，1970年），卷三、《太炎文錄》別錄（臺北：新陸出版社，1970年），卷一、《民報》第16號，1907年等書。

²⁰ 王樾：〈章太炎的儒俠觀及其歷史意義〉，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

章太炎對於身為一個知識分子應當有的救世、救國責任感如此強烈，政治迫害也不免牽累於他。在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的戊戌變法失敗後，章太炎自云：

其秋，康有為得清主寵任，以變政獲罪。清廷稱朝野論議政事者為新黨，傳言將下激黨令，群情惶懼，日本有與余善者，招游臺灣。九月，攜家南渡。²¹

就在戊戌變法失敗的肅殺風氣下，章太炎於明治31年（1898）來到臺灣，並來到臺灣任職「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欄的記者。此時，《臺灣新報》也已經改組為《臺灣日日新報》，章太炎的到來，與李逸濤、魏清德（1887-1964）和謝雪漁（1871-1953）等人成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同事，一起為臺灣的報業努力。²²

那麼，從何處可以觀察出章太炎的思想對李逸濤有很深的影響呢？章太炎在臺灣雖然只停留半年多，但李逸濤對於章太炎離開臺灣後的種種行動，仍藉由記者的身分予以極大的關注。章太炎離開臺灣後，西元1902、1903年先是在日本東京組織「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軍國民教育會」等組織，可以說是「光復會」的先聲。之後章氏回到上海，和著有《革命軍》的鄒容兩人批判清政府、鼓吹革命思想的舉動過於激烈而被捕下獄，此即震驚全國的「蘇報案」。²³雖然在當局的鎮壓下，章太炎等人失去了自由，但他的行為，刺激了上海浙江人的團結，其後在蔡元培（1868-1940）、陶成

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71。

²¹ 章炳麟：《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7。

²² 根據黃玉齋的訪問魏清德：「同事中有李逸濤先生年紀較輕，與章先生最友善。一日，章先生到逸濤先生家中看見逸濤先生正在讀《漢書》……。」又聞謝雪漁對章太炎的描述，故以李逸濤和章太炎的交情最深。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台北文物》第5卷第4期（1957年6月30日），頁43。

²³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24。

章（1878-1912）等人的合作下，中國辛亥革命時期重要的團體「光復會」成立。「光復會」成立之時，章太炎雖然在獄中，但從其所著〈在獄中嘗致書元培等策勳之〉可以了解，章太炎對於「光復會」的成立是有影響的。²⁴到了1909年，章太炎成爲「光復會」的會長，因此章太炎可以說是帶動整個浙江的革命風氣。²⁵此後「光復會」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吸引了徐錫麟（1873-1907）、秋瑾（1875-1907）等人先後加入「光復會」，兩人並組成「光復軍」，發起「安慶起義」，可惜宣告失敗，兩人皆從容就義。

章太炎、鄒容影響下的「光復會」培養出徐錫麟、秋瑾兩位革命烈士，身在臺灣的李逸濤不但注意到，還將這些事蹟，轉化成李氏在小說中不斷提及的例子，可見李逸濤受到的震撼是相當深遠。例如〈雙鳳朝陽〉描寫主角「繼漢」受到徐錫麟之事的連累，被迫逃亡，不幸爲恩將仇報的清廷總鎮所拘捕，幸得有婚約的總鎮之女相救，才得以由虎口脫險，李氏描寫到：

以浙人徐錫麟已於其鄉先唱之，並致書詢問，乃事未成，會錫麟以刺皖□敗，株連其眾，繼漢聞之竊自懼。²⁶

〈俠鴛鴦〉則先在〈前言〉中讚美秋瑾爲表率：

俠之爲義底而狹，初非好勇鬥狠者，所可同日語，……獨是數十年來之支那，積弱已達於極點，而士大夫之恥言任俠如故。……或曰近年女界勃興，奇女子肩項相望，如秋瑾女士其人者，視此不更足多耶。²⁷

接著又以徐錫麟的起義爲引子，展開對整篇小說的鋪陳：

²⁴ 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199。

²⁵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頁289。

²⁶ 逸：〈雙鳳朝陽〉，《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3版，1910年1月1日。

²⁷ 逸：〈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1月11日。

丁未五月廿六日，支那大俠徐錫麟，刺殺皖撫恩銘之變，內而朝官，外而疆臣莫不相顧動色，惴惴然有舟中皆敵之危。²⁸

交陳伯年未匝月，而徐錫麟之事起，同時有中表兄楊清來者，亦座是在逃。²⁹

對於「光復會」的兩位革命烈士，李逸濤藉著小說給予極高的讚賞，但其他的革命會黨例如「哥老會」，李逸濤則在〈俠鴛鴦〉中將其描寫為負面的角色：

旋見為首一人厲責叟曰：「張榮何嘗為哥老會，尤何嘗入革命黨？汝主以睚眦小怨，必殺之以邀功？今張已矣，古云殺人人亦殺其子，今日之事，如是焉已耳！」³⁰

蓋今日之軍隊，舊軍既多歸附於哥老會，新軍又多半通革命黨，揚州之役，即其陰謀，公所以不死者，蓋心慕女公子，欲因之迫婚也。³¹

小說〈俠鴛鴦〉中的男主角「陶鑄」因受到徐錫麟的起義事件受到連累，在逃亡的過程中，巧遇「哥老會」的黨徒欲對一老僕及其所保護的公子、小姐不利，

「陶鑄」雖然仗義替三人解圍，解救了官府吳大樹的兒子和女兒，並因此與其女「瑟靈」種下了愛苗，卻也在此意外中，除了面對官府追拿，還得罪了「哥老會」黨徒張華、張榮兄弟等人。在小說中，可以發現李逸濤並不將「哥老會」視為真正的「革命黨」，他們逼迫孩童弱女的行徑，反而和盜賊相去不遠。隨著小說的情節發展，也可以發現開頭要為「張榮」報仇的言行全都是謊話，因為「張榮」並沒有如小說前述般被官吏殺害，同時，他還是「哥老會」的領導

²⁸ 逸：〈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1月12日。

²⁹ 逸：〈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1月19日。

³⁰ 逸：〈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1月19日。

³¹ 逸：〈俠鴛鴦〉，《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2月9日。

者，並在小說中持續地帶領「哥老會」成員們要捉拿男主角「陶鑄」和女主角「瑟靈」。「陶鑄」和「瑟靈」兩人不但要面對離散的痛苦，還要受到清朝官員和「哥老會」兩方面的威脅。於是，與「光復會」成員徐錫麟相善的「陶鑄」成爲正派代表；「哥老會」在清末雖然也是反清的革命團體，卻被描繪成盜匪般的負面色彩。由此可見，李逸濤對於「光復會」的支持和喜愛，顯然高過於同時期其他的革命團體，這種態度，是在與章太炎相善的前提下，對於「光復會」的成員和行爲，給予較高的評價，不然，爲何清末的其他革命團體或是會黨例如「終南會」、「雙龍會」、「白布會」、「伏虎會」等，³² 李氏都沒有在評論文字或是小說中提及，而不斷地在相關文章中強調徐錫麟、秋瑾這兩人的事蹟，甚至爲他們感到悲憤呢？可見章太炎、光復會等人或革命團體，對李逸濤革命觀的養成是有影響的。

日治初期，由於殖民政府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較爲寬鬆，所以臺灣往往成爲革命人士躲避清廷追捕的避難所。陳少白、孫中山和章太炎等三位中國革命運動中的要角先後前來臺灣，讓兼具文人與記者身分的李逸濤對於「革命」的了解，不再只是第二手的認識，而能沉浸於其中，感受這些時代先行者的抱負和熱情。而三人中的章太炎來臺半年，時間較其他兩人爲久，更是直接與李氏培養出更爲深厚的交情，連帶擴大李氏對於中國革命團體，特別是「光復會」的認識。那麼，李氏所表現出來的革命觀念，又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特點呢？

二、推翻專制、驅逐韃虜：李逸濤的革命觀

李逸濤革命觀的來源，與幾位來到臺灣、領導中國革命的人物有極大的關係，尤其是章太炎和「光復會」對李逸濤革命觀的影響，更遠遠超過於其他的革命團體。那麼李逸濤對於「革命」這個風行於

³²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 293-294。

當時的詞彙，抱持著什麼態度呢？在〈清國果可振興乎〉中，李氏對「革命」提出了自身的認知：

夫革命之主義亦有二，一則欲改革社會，促政府之立憲，一則欲推倒舊政府，別立新政府以代之。³³

從李氏的小說和評論文章之中，可以發現李逸濤對於「革命」的使用，實乃偏重於「推倒舊政府，別立新政府以代之」的觀念，並以「革命」來指稱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滿清政府的反抗行爲，例如翻譯日本學者「二楸庵主」所著的〈志士傳〉時，³⁴ 李逸濤直接以「革命軍」、「孫之惠州革命」等來指稱中國起義反清事件。〈革命之半面相〉則將章太炎、陳少白、容闈（1828-1912）等人包括在內，認為他們的活動皆可稱之爲「革命」。小說例如〈革命奇緣〉中提及：「君爲漏洩革命，繫累玉典史一家」、〈雙鳳朝陽〉也描述：「有婿王繼漢爲革命黨與徐錫麟通」等，³⁵ 對於李逸濤而言，用「革命」來一詞來稱乎中國發生的起義事件是理所當然的事，那麼，到底要具備哪些條件，才是李逸濤心中所認定的「革命」？

（一）批判清廷專制腐敗

中國辛亥革命的興起，主要原因乃是清廷腐敗所導致，在列強的爭先進逼下，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的國運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甲午戰爭的失敗，更導致臺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對於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李氏而言，雖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下展開新的生活，但對於在清廷統治下的中國，李氏仍持續關心。所以，李逸

³³ 逸濤生：〈清國可振興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06年1月1日。

³⁴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2月8日。

³⁵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6月27日、〈雙鳳朝陽〉。

濤一方面藉由文字展開對清廷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期望能有見義勇爲的人物出來共赴國難、解救中國。例如在〈革命奇緣〉中，批判滿清的專制暴虐：「以滿人專肆壓制，誅戮志士，其毒有甚于暴秦之焚書坑儒。」³⁶而主角「子翼」則因個性狷介，對時政頗有不滿，遭到在清廷爲官的故友「蘇某」陷害，若來殺身之禍，幸賴「三姐兒」主婢二人相救，不但得以脫身，甚至成就了一段亂世佳話，李氏藉由「子翼」之口，欲提振革命的士氣：

子翼素狂直，不設城麻，聞而憤然曰：「子當以宦海爲樂國耶。盍一讀鄒容之革命先鋒，當不復言仕矣！」³⁷

李氏筆下的「子翼」，受革命烈士鄒容影響甚深。由於李氏在刊登〈革命奇緣〉前才剛翻譯了〈志士傳〉，文中對鄒容極爲推崇，似乎想以小說主角「子翼」作爲鄒容的傳人，以在清廷的腐敗政權下延續革命精神：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人。年十七留學於日本，會江南武備學生監督姚某，有姦淫之事，彼與同學十餘人，突入其室而毆之。事既發覺，乃微行而歸上海。時章太炎方在愛國學社，彼至是始識章，未幾示以《革命軍》一書，請敘刊行。章尤常主排滿主義，於是清政府目二人爲首逆，假英租界巡捕之手，捕章投之獄。章之繫獄也，彼聞之，乃徒走赴獄曰：「我鄒容也！」巡捕曰：「豎子僅五尺，寧能作《革命軍》？可速去，勿自苦。」彼曰：「試取革命軍來一書，我即解說之。」巡捕因開鐵窗使入。

明年獄決，章處禁錮三年，彼則二年。其因爲獄卒所酷虐者，初非語言所能盡。章自以我死則容寬，因圖餓死，絕食及七

³⁶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上）。

³⁷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上）。

日，終不能死。明年二月，彼竟憤恚成疾，越二十日疾益甚，是夜積陰不開、天寒雨濕，晨雞初唱，遂死於獄。天下最悲怛慘怛者，孰有過於此者乎！念之不禁嗚咽。彼有絕命詞曰：「願力能生千猛士，補牢未及恨亡羊。」嗚呼！言猶在耳而感憤興起者誰耶？擲筆四顧，曷勝天地皆秋哉。³⁸

相較於〈革命奇緣〉建構「子翼」青年志士形象以對抗清廷的專制腐敗，〈兩教主相約東遊〉則以代表中國傳統的兩大經典人物孔子和釋迦為例，用寓言方式和諧談口吻，描寫某學究聽到釋迦、孔子兩人欲東遊日本的對話，而後清朝入關皇帝福臨出現勸阻，願兩人續留中國但被拒絕，藉者兩教主拒絕的理由批判滿清：

兩教主方談論間，忽又見一王者歷階而上，著滿州衣冠，揖孔聖人而曰：「小王愛親覺羅福臨氏，聞我夫子將去我國，特來慰留，以保國粹。」孔聖人莞爾而笑曰：「我道之不行久矣，大王所用以治道者，皆老氏之道，非我所謂道也。大王其問諸老氏。況汝之七世婦那拉氏，因其日暮途窮，常喜倒行逆施。如康梁徐錫麟案，皆株連無辜、絕滅人理，非混世魔王，無肯與之周旋者，某何能為？」³⁹

「那拉氏」指得即是當時掌握全局的慈禧太后（1835-1908），藉由佛教的代表人物釋迦佛和儒教聖人孔子間的對談，表達出對於清朝政府的失望和不滿，最後更痛斥清廷當政者對康有為、梁啟超和徐錫麟等人的暴虐。可見對李氏而言，「革命」不分傳統人物或現代青年，在國政專制腐敗下，已成為當時的全民運動。「消閑錄」專欄中的〈強中之弱〉、〈閹官敗法〉則分別斥責清國人被外國人所輕視、沒有骨氣

³⁸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1907年2月13日。

³⁹ 逸：〈兩教主相約東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8月9日。

的行為和清廷官員的愚昧：

外人之賤視清國人者，皆目之爲弱蟲，出洋之人因無有保護也，苟有橫逆相加者，笑晰由他、生死由他，唯仰人鼻息之暇，何嘗有少許丈夫氣敢爲怒蛙之鳴？⁴⁰

近有周御史奏於清廷，謂革命如此之盛，實由派遣留學生於日本……實由於科舉之停，與八股之廢，以致三綱五常，盡墜於地，試觀八股尚存時，曾有此革命乎？……請即再試八股。……此御史奇想天開，不知現世界爲何事物，亦可謂不通之極矣，或曰思八股之腐儒何限眾，該御史特其代表之一人耳。⁴¹

文中諷刺清廷國威不振，導致官員、人民面對外國人時都缺乏應有的尊嚴，這種「媚外」、「懼外」的舉動，都是起因爲自身的政治不修，才會被外國人視爲「弱蟲」，而朝廷中食古不化的官員，竟然還認爲革命聲勢日漸浩大是因爲廢考八股文，導致禮教淪亡的結果！李氏在文中批評清朝的官員仍不曉得正視外在世界局勢的變化，於是以「不通」、「腐儒」的言詞予以批判。也因爲清朝官員的迂腐，才會導致革命運動的興起，在〈革命之半面相〉中他說：

孫逸仙於日清戰爭前，尚未公然革命也。曾上書張香□請大興□桑，凡七往復，不得一見而原書亦不批示，……然則迫逸仙必出於革命之舉者，香濤之咎。……時容閔尚在美國，香濤以長電促之歸，……往會香濤至再，亦不得一見，……越三年而康梁因變政事敗，清政府竟株連及閔著江督追捕，……由是一變而爲革命清政府終無如之何！嗚呼，孫容兩人之革命，皆以香濤激成之。⁴²

⁴⁰ 逸：〈強中之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10月20日。

⁴¹ 逸：〈閹宦敗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9月18日。

⁴² 逸：〈革命之半面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7月11日。

文中的「張香濤」指的是中國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但李逸濤在這裡顯然有訊息上的錯誤，甲午戰爭時孫中山上書提建言的應該是李鴻章（1823-1901），而非張之洞，⁴³但李氏認為，革命的火花之所以會興起，官員的不納諫言、不思改革，甚至派人追殺的卑劣行爲，是導致有志之士要革命的原因，而非只是單純的叛亂而已。

滿清政權的腐敗，讓政治上曾經屬於中國人的李逸濤感到悲痛萬分，雖然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李氏能維持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對於中國的積弱不振，他仍表示出自己的憂心。因此，李氏往往藉由小說的書寫，期待能出現「爲國爲民」的俠客，將國家局勢轉危爲安，想像著國家能夠轉危爲安，明治四十年的〈兒女英雄〉，將女俠「沈月英」描寫爲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其勇氣和智識甚至超越男性，小說中提及：

沈月英，清之姑蘇人也，……誓必樹勳于絕域，爲中國一吐六十年來不平之氣。⁴⁴

對於彼岸飽受欺凌的中國，李氏有著「恨鐵不成鋼」的遺憾，透過俠敘事，希望能有改善民心、民氣的教化作用，如〈義俠傳·自序〉說：

嗚呼，義俠之風，其衰已甚，安得多如周李者，散播于光天化日中，以厚民心而強民氣哉？⁴⁵

李氏對於清廷的批判極爲嚴厲，對於清朝的官員更是毫不保留地予以痛斥，相形比較下，對於革命運動中主要的領導人物，李逸濤不但大加讚賞，還希望這股風潮能在眾人起而效法下，擴及成爲全民運

⁴³ [美] 史扶鄰 (Harold Z. Schiffrin) 著，邱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頁30-34。

⁴⁴ 逸：〈兒女英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1月11日。

⁴⁵ 李逸濤：〈義俠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1月15日。

動，以便喚起每個民眾的「民心」和「民氣」，共同為中國的未來而努力。

（二）強烈的漢族中心觀

清廷以滿人的身分入主中國，對於擁有漢族身分、自尊為正統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件悲痛的事，清初大儒顧炎武（1613-1682）針對明朝亡於異族之手，已經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說：「有亡國者，亡天下者，兩者宜辨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的觀念，⁴⁶ 顧氏認為「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替，但「亡天下」則是民族滅亡的危機。到了清末，在內憂外患的紛擾下，為達成革命的成功，滿漢之分的種族問題，重新被運用到革命的推動中。

身處在臺灣的李逸濤，在大力鼓吹革命運動的同時，對於種族間的問題有什麼樣的看法呢？在翻譯日本人「二楸庵主」所著的〈志士傳〉中，⁴⁷ 李氏將種族問題清楚地鋪陳出來：

滿洲復入主中夏，於是頓起人種之爭，……蓋在元則有准右布衣朱元璋，在清則有粵西教主洪秀全，惜乎洪軍雖其鋒極銳，而功不果，十八年而遂亡。種界之問題，遂將解決而猶未解決也。⁴⁸

⁴⁶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中華書局珍倣宋版印），卷13。

⁴⁷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二楸庵主」是誰？筆者曾就此問題就教於東吳大學日文系吳佩珍教授，承蒙吳教授提供不少線索供筆者加以查訪，可惜目前皆未能考證出其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應當是「二楸會」中的成員，「二楸會」是中國革命時，日本支持中國革命的一個團體，目前發現有以「二楸會」為名義所著文章〈支那秘密結社（二）興中會〉，《革命評論》，明治39年11月上。請參考陳鵬仁譯：《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臺北：水牛出版社，1990年），頁270。

⁴⁸ 陳鵬仁譯：《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臺北：水牛出版社，1990年），頁270。

〈志士傳〉是一篇介紹革命烈士的傳記式文章，所介紹的馬福益（1865-1905）、史堅如（1879-1900）、鄒容（1885-1905）、陳天華（1875-1905）和吳樾（1878-1905）等，皆是歷史上可考的人物，其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事蹟，更是為人所激賞。文中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元、清二朝皆為異族統治的朝代，雖然在元朝後有朱元璋恢復漢人的統治，但滿清時期最有可能恢復漢人統治的太平天國最後卻失敗了，似乎只能仰賴紛起的革命運動，期待能再度恢復漢族的江山。又說革命志士吳樾投身革命，是因為：

時機一變，種族之思想，勃然興起於人心，非曰驅逐胡虜之客帝，即曰恢復中華之主權。⁴⁹

小說〈革命奇緣〉開頭也描寫主角「子翼」是：「且斤斤于滿漢之界，謂非革命不足以存漢。」⁵⁰〈支那看革命黨看者〉也認為：「支那之革命黨，尤為解決種族問題，要在推倒滿政府。」⁵¹皆流露出對於滿／漢間的種族區隔，是革命運動不可忽視的一個條件。

其實，清末的革命團體，幾乎都充斥著排滿主義的革命觀念，不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誓詞力主「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⁵²明顯地認為「韃虜」（滿清）和「中國」（漢族）是兩個相對概念。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中，「排滿」也是重點之一，甚至將自己的「革命」解釋為：

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⁵³

⁴⁹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2月14日。

⁵⁰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上）。

⁵¹ 逸：〈支那革命黨看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7年11月9日。

⁵² 《國父全集》第6冊，頁232-236。

⁵³ 《民報》第8號，頁13。

雖也是以「光復中國種族」為主要目的，但文中可見章太炎對「革命」一詞的態度，不但有所保留，甚至予以排斥，⁵⁴不難理解，以章太炎做為主要推動者的「光復會」為何要取名為「光復」了。

整體而言，排滿的革命思想是當時各個革命團體的共同目標，與孫中山先生一派、並與章太炎友好的李逸濤就算和兩者沒有交集，以他身為記者，對時事接收的迅捷而言，會受到排滿思想的影響是必然之事。但值得思考的是，同樣都是談「革命」，李氏雖然與章太炎友好，但他在評論文章和小說中並沒有使用「光復」等字眼，而是用「革命」的字眼來表達。那麼是否受到孫中山先生的影響呢？根據陳建華的考證，二十世紀初期孫中山先生號召「革命」時，是與康有為、章太炎等人類似，對「革命」懷有戒心：

上面說及孫中山與康梁等改良派的「革命」觀念也絕緣……，即便如此，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數年裡，對於是否用「革命」來翻譯 revolution 仍是不穩定的。⁵⁵

聯繫到當時的中文語境，孫中山把「天命無常」作為宣傳口號，其實是一種自然的選擇，……但和在英文竭力避免使用 revolution 或 revolt 卻有著內在邏輯的連貫性：在中文裡不用「革命」或「造反」。⁵⁶

不過，陳建華續指出，在1895年赴日時，孫中山先生不但接受日本報紙將其稱之為「革命黨首領」，甚至認為以此可以召集到更多的革新力量：

根據陳少白（1869-1934）和馮自由（1882-1958）的記載，孫在1895年宣稱他自己是「革命黨」。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逸

⁵⁴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1-12。

⁵⁵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頁114。

⁵⁶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頁115。

仙逃往日本，見到神戶報紙稱其為「革命黨」。孫對同行的陳少白說：「『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可稱革命黨可也。」⁵⁷

在當時的語境下，雖然章太炎、孫中山是否使用「革命」都還有待思考，⁵⁸但不可否認在他們的心中，都已深知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實正是「革命」，只是名稱或有不同，這對於李逸濤仍會有影響的，尤其章、孫、陳三人又都來過臺灣。那麼，李氏所使用的「革命」，可能受到何方的影響較大？陳建華考察中國古代文獻中的「革命」用語，並梳理了「革命」一詞從中國輸入到日本成為音讀“かくめい”的過程，其中雖然有根植於中國易姓革命的思想傳統，也有關於日本萬世系天皇的歷史事實，⁵⁹但在最後，終於成為帶有改革、改良意義的字眼：

至江戸末期，激進的愛國志士提倡「尊王攘夷」運動，革命話

⁵⁷ 陳建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245。陳氏此語參考自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頁12。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初集，頁1-2。以及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98-100.

⁵⁸ 陳氏對於孫中山先生是否這麼容易就接受「革命」的用法存疑。陳建華：〈孫中山何時自稱「革命黨」？——早期思想地圖「革命」指涉的勘探〉，收於《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04年），頁13-32。但本文認為，孫中山先生在1896年10月，接受英國翟爾斯教授的邀請所作的〈自傳〉中，曾有提到對中國的商湯、周武以及美國的華盛頓等人表示景仰。無論孫中山先生一開始對於「革命」這個觀念是排斥還是接受，可以肯定的是，「明治維新」的成功，對於當時的孫中山先生或是臺灣的李逸濤，乃至於全亞洲的知識分子，都造成極大的震撼。可參考孫中山：〈自傳〉，《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73年），頁2。以及蔣永敬：《孫中山與中國革命》（臺北：三民書局，2000年），頁14。

⁵⁹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頁8。

語在與儒學、神道相結合的情況下被重新鑄造，……傳統的革命理論與「改革」或「維新」的意義相近。

在明治時代，由於「革命」一語包含的尊王改革之義已經深入人心，所以「明治維新」和「明治革命」變成了同義語。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到日本，不久變發現日人將英語 revolution 一詞譯成「革命」，其意義並非僅指政權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的「淘汰」或「變革」。⁶⁰

陳建華對於「明治維新」和「明治革命」意義相近和同義語的考察，在日治初期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可見端倪。李逸濤發表〈清國果可振興乎〉前，就曾在〈袁世凱〉一文中，以「改革之將來」為題，抨擊清廷雖屢有改革之舉，但成效不彰：

倫敦泰晤士，世界報中之泰斗也。嘗著論清國之改革曰：「日本之改革，堅牢如石室。清國之改革，脆弱如紙板。」其言似不無過酷。然由一面而觀。則猶有真理存焉。⁶¹

文中援引英國《泰晤士報》的論點，來加強自己對清國革新的意見，表現出李逸濤對於西方知識的認識，也以此指出清廷的改革行動並沒有真切地興利除弊，和日本的維新運動實在不能相比，他又更進一步地指出：

此雖過渡時代所必經之常徑，而清國朝野不加深察，自謂與我明治維新之大改革同，不須累世窮年，可以見諸實效矣！是亦輕信之甚也。⁶²

⁶⁰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頁9。

⁶¹ 逸濤譯：〈袁世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06年7月19日。此文雖題為「逸濤譯」，但應僅指翻譯西文報紙的部份，且通篇充滿李氏個人的議論，故仍可代表李氏的思想。

⁶² 逸濤譯：〈袁世凱〉。

文中將日本的維新運動多所讚美，甚至引以自豪，襯托出清廷的改革運動只是「區區為皮相的改革」，⁶³唯有下文指陳地由制度上根本的改變，才是痛定思痛的大破大立，並救中國於危急存亡之秋。於是，「維新」思想成為李氏認為救中國的不二法門，而「革命」之意，也與「維新」不謀而合，來自中國各方人士的「革命」論與源於日本的「維新」觀，兩者就在李氏的思想系統中逐漸合流。

此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還有作者以「溪州牧豎」為筆名，刊載一系列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主的歷史人物傳記〈維新志士列傳〉，為期將近兩個月，內容主要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人物「岩倉具視」（1825-1883）、「木戶孝允」（1833-1877）兩人。⁶⁴但內容中也對於日本明治維新時各藩間的矛盾、爭鬥多所著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人物例如「西鄉隆盛」（1828-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自然也未從這一系列的文章中缺席。⁶⁵

雖然我們無法肯定〈維新志士列傳〉的作者「溪州牧豎」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但〈維新志士列傳〉無疑是宣揚明治維新成功的樣版文字，既有向殖民者示好的成分，又具備宣揚日本國威的意圖。這個意圖，對具文學界和記者界雙重身分的李逸濤而言，「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唯革命不足以推翻滿清」的觀念，至此和崇尚日本明治維新的態度交相疊合，「革命」等同於「維新」的想法，也在無形中慢慢成形。

李逸濤喜歡使用「革命」一詞來撰寫他對中國「革命」的評論和想像，表現他對清末革命運動的嚮往和關注。但他對於「革命」一

⁶³ 逸濤譯：〈袁世凱〉。

⁶⁴ 溪州牧豎：〈維新志士列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06年1月26日-2月21日。

⁶⁵ 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並稱為日本「維新三傑」，木戶孝允是讓「版籍奉還」得以成功的要角，而岩倉具視則是信奉復古思想，主張幕府應該還政於天皇的藩主。池田敬正著，朱元等譯：《日本明治維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7年），頁172、208。

詞的使用，除了有來自於孫中山等人和章太炎的「革命觀」影響外。也因身處日本殖民統治，在與日本官紳交好並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影響，造成他對「革命」一詞的運用，也有源於日本對「革命」見解和運用的可能。如此，李逸濤在運用「革命」時，也較符合“revolution”的定義。

（三）革命，亦或是立憲？

晚清的國勢已經達到一個危急的時期，在康、梁二人為首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後，新一波的改革訴求又再度地被提出，有鑑於甲午戰爭一役，中國竟然在過去被視為「倭」的日本手下慘敗，中國國內開始思考日本為何能富強？改革的方針於是開始希望中國也能像日本一樣，成為「君主立憲」的國家，⁶⁶於是甲午戰後，除了革命運動持續進行外，立憲的訴求也開始在中國發酵。

由於近代中國產生了強大的階級分化，也導致了主張立憲者往往是以社會地位較高、政治影響較顯著的社會上層階級主義者為主，而革命派則多是主張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政體的中下階層居多，⁶⁷兩派的主張雖然互異，但其思潮卻都傳播到臺灣，那麼，李逸濤是否有考慮過「立憲」來代替「革命」，以做為拯救中國的方式呢？由於深感滿清的腐敗，兼及種族上的排滿傾向，李氏在〈支那革命黨看者〉中以俄國發生的刺殺案為例，表達出自己的政治傾向：

亦以二十世紀之世界，斷無專制政體之立足地，俄苟始終不立憲，則彼即始終與之為□耳，願清亦猶俄耳。⁶⁸

從此段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逸濤對俄國所發生的刺殺案是大為

⁶⁶ 郭漢民：《晚清社會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11。

⁶⁷ 郭漢民：《晚清社會思潮研究》，頁214。

⁶⁸ 逸：〈支那革命黨看者〉。

激賞的，甚至認為俄國會被推翻，最大的癥結就是在於俄國沒有立憲，所以李氏也希望清國的立憲運動不要成功，這樣清國才能走上與俄國相同的路，也就是被革命所推翻。

李逸濤對革命的態度是堅定的，認為革命是打倒滿清、拯救中國的最好方式，所以「立憲」對李氏來說，只是包括在「革命主義」中的一個方法，⁶⁹ 李氏雖然不希望滿清的立憲成功，但對於「立憲派」、「革命派」乃至包括在「立憲派」內的「保皇黨」，評論都還算公允，〈清國果可振乎〉一文即言：

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歸路已斷。無家可投，自南自北，皆不得求憐於漢族，滿政府亦已知之，故下後十四年決行立憲之詔，以緩革命黨之謀，以慰天下人之望，滿政府之用心，亦云苦矣。⁷⁰

李氏也察覺到滿清政府欲使用「立憲」的方式來抒解國內的革命氣氛，對滿清政府此一舉動，李氏並沒有因為理念的不同就予以抵毀，只是李氏認為，「立憲」的時機已過，所以只能依靠「革命」來救中國了，例如在〈志士傳〉文末的「譯者曰」中，李氏就認為：

蓋東西各國之立憲，鮮不以頭顱心血購之者也？又篇中有馬氏以不能為漢族造幸福責曾文正一事，意謂當金陵克復時，如敢為之，則舉義以興漢而滅滿不敢為之，亦可乘機為漢族立憲，……抑知曾文正固不能為第一義，即云第二義。是時立憲之事，支那尚鮮能知者，尤何責焉？……但士有各志，或主排滿漢，或主滿漢分治，皆任有志者自為之耳，初何必以革命為是，保皇為非？⁷¹

⁶⁹ 逸濤生：〈清國可振興乎〉。

⁷⁰ 逸濤生：〈清國可振興乎〉。

⁷¹ 二楸庵主著，逸濤山人譯：〈志士傳〉。

李氏認為曾國藩以漢人身分，沒能在克復太平天國時，藉機奪回漢人政權已是可惜，而未替漢人爭取立憲的機會，亦是讓人遺憾的結果。李氏在文中認為，「革命」、「保皇」沒有誰是誰非，只是立意不同，並未藉此攻訐保皇派。而對於日後力主「立憲」的康、梁二人，雖然李氏與章太炎的交情深厚，但並沒有因為章太炎攻擊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駁康有為政見書〉，而一面倒地附和章太炎的論點：

然所謂成成變政主動者之康南海，不嘗籌畫於其間乎？豈康亦承認其革命乎？個中消息，尤匪疑所思矣，抑章氏故以此誣唐而誣康也耶？⁷²

由上述的評斷，可發現李逸濤並沒有因為和章太炎相善，就附和章太炎對康有為的攻訐，而是明白地告訴讀者自己心中未能解釋清楚的疑問，從較客觀的態度來面對「革命」與「立憲」間的紛爭。不過，若將種族的問題置入考慮，基於漢族的中心觀點，李氏對於康、梁二人的批判則是明顯的，在小說〈革命奇緣〉中描述主角「鍾子翼」的態度：

成成變政，見康、梁奔走國事，心竊非之，以為滿人暴戾至此，不乘其積弱難返之餘，繼洪□之志而殄滅之，反甘心效曾左李諸人，為滿人之大奴隸，以壓制我同胞。⁷³

李氏雖然對「革命」的態度是堅定，但他卻沒有因此忽視對「立憲」、「保皇」的努力，但只要一和種族的問題有所牽累，李氏的明顯地是從「漢人至上」的觀點出發，只要這些非革命的活動是受制於滿人，李氏都會不留情地加以批評。

⁷² 逸：〈革命之半面相〉。

⁷³ 逸濤山人：〈革命奇緣〉（上）。

三、革誰的命？李逸濤「革命」中的認同傾向

身為記者的李逸濤，對於接受外在的時事和思潮是比一般人便捷，而中國傳統文人和記者的雙重身分，又讓他能夠與革命的領導分子如陳少白、章太炎等人交流。但是，身處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李逸濤，在面對「革命」的議題時，應該如何去處理自己曾經「中國人」，而後成為「日本人」雙重身分？

李逸濤對中國的政治局勢是不滿且失望的，所以他才會期待能有急公好義的人出來救中國，同時又大力提倡革命。相較於積弱不振的中國，明治維新成功、全面現代化的日本，對於生長在臺灣的李逸濤來說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特別做為因為中日戰爭失敗而被「割讓」的臺灣人，所以李氏在以文字力主革命的同時，往往也流露出對日本的欽慕。〈兩教主相約東遊〉就假托釋迦佛陀和孔子二人的對談，把自己對日本的嚮往表露出來：

少選聞孔聖人謂釋迦佛曰：「尊者別來無恙否？」答曰：「噫殆矣，今支那學堂林立，多以佛寺改充學堂，夫我國自被回教蹂躪後，教徒多叛佛而歸回，老納即往來於日本支那間，不復西歸矣……，日本安所適歸哉？願夫子明以告我。」⁷⁴

作者描述釋迦佛陀因為中國把佛寺改成學堂，又受到回教傳入的影響，以致對於中國的佛教信仰感到悲觀，而有東往日本的意念，於是詢問孔子，日本是不是一個合適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

孔聖人亦愀然曰：「某有此志也久矣！元明以降……我道已厄焉不昌，即命陸子王子，往察日本之道統，近據陸王奏覆日儒

⁷⁴ 逸：〈兩教主相約東遊〉。

之所學，果尤當于實用且其老師宿儒，更群起重修丁祭。」⁷⁵

此後，作者安排滿清入關皇帝福臨出來慰留夫子，因為孔子乃是「國粹」，但被孔子所拒絕，藉孔子之口批判清政府的腐敗後，三人同化為煙塵而去，於是：

學究連呼大怪，驀然驚覺乃知是夢，遂不禁大哭，……則曰：「孔子去，斯文喪吾儕將無喫飯處矣，……。」學究終不與悟，但曰：「汝可為我趣裝，我不日當留學日本，從我夫子之後，為之執鞭蹬焉。」⁷⁶

「學究」其實就是李逸濤對自己的自嘲，此篇文章雖然是發表在「諧談」專欄，表面上看起來只是搏君一笑，但在寓言式的詼諧筆法下，卻流露出李氏對中國的失望，當像釋迦佛陀、孔子這樣，在中國具有指標意義的聖賢，都欲離開中國前往日本時，更何況做為兩位聖人信徒的我們呢？到了小說〈亡國志士〉刊登時，李氏對於日本政權的認同，又表現地更為深刻，〈亡國志士〉以越南革命為背景，描寫主角黃氏被法國政府追拿，在友人的幫助下，冒名與友人一起東遊日本，小說最後，李氏言及：

惜乎，不使彼一來臺灣，見我政府之煦煦若保赤子，惟恐我臺民不同化於日本，毫無歧視心，彼當不勝天堂地獄之感也！我臺民處此小桃源，其亦知帝德矣，故筆之以為忧心警目之一助。⁷⁷

作者以越南志士做為對比例子，雖然法國、日本同是殖民者的身分，但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卻是大肆地歌功頌德，向日本當局示好，而接連在兩篇作品中提到「東游日本」，除了是李氏對日本帝國的嚮

⁷⁵ 逸：〈兩教主相約東遊〉。

⁷⁶ 逸：〈兩教主相約東遊〉。

⁷⁷ 逸：〈亡國志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0年1月21日。

往外，「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二人逃往日本，也影響到李逸濤往往在小說中安排「東游日本」的情節。⁷⁸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前述李逸濤是極具漢族中心主義的文人，在描寫「革命」文字中充斥著強烈的排滿思想，但對於異於漢族的大和民族，卻沒看到李氏有任何批評或是不滿的言論。對李逸濤而言，日本因明治維新成功而將國家推向強國之林，是讓李氏對日本神往不已的原因。李氏的所做所為，實是希望以日本的維新成功做為一個良好範本，將其制度與精神，運用到中國的改革運動中，讓中國的革命運動，有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般，得到讓人尊崇的功效。至於，到底是哪個國家較適合掌握臺灣的統治權，在當時中國與日本強弱不均等的情况下，李氏自然不免有傾向於當政者的言論出現。

再者，李氏並沒有藉著這些鼓吹革命、並嚴分滿漢種族的文字，暗地裡指責殖民政府「非我族類」。例如〈兩教主相約東遊〉中的孔聖人與釋迦牟尼，兩人主動且積極的東渡，淡化和漢之分的色彩，畢竟，當中國奉為聖賢的人士們都欲離開混亂之境，而東渡日本時，李氏已將中國文化得以延續的夢想，寄托於富強日本。但李氏也沒有完全地將「中國人」的過去給忘記，所以一方面懷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對中國展開批判和憂心，一方面卻又藉著革命文字與日本殖民者展開對話，⁷⁹於是演變成一個矛盾的現象：李氏要「革」的「命」，是清廷的「命」、是滿人的「命」；李氏並沒有以身為「中國人」為恥，但卻對過去身為「清國子民」的身分感到厭惡，因此對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並沒有太大的抗拒，反而藉此希望能脫離清政府的惡政和

⁷⁸ 例如〈梁啟超其捲土重來歟〉中，提及「戊戌政變後，梁啟超亡命我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07年8月20日。其他例如〈志士傳〉、〈革命之半面相〉對於康、梁兩人的變法與失敗，李逸濤皆有所描寫，見逸：〈亡國志士〉。

⁷⁹ 巴巴（Homi Bhabha, 1949-）跳脫了薩伊德、法農在後殖民論述上過於僵化、單一的論述，主張殖民關係中彼此矛盾的心理情感模式是流動循環的觀點，請參考〔英〕巴特·摩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彭淮棟譯：《後殖民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頁207。

腐敗。以此觀點出發，說明李氏的種族態度是堅決地「漢人至上」，但他的國族認同態度是矛盾且複雜，而非能簡單的就以「親日」或是「非親日」來為李氏的意識型態做出評斷。因為當李氏期待殖民政府的統治改變臺灣、讓臺灣進步時，他卻也必須面對非漢族的大和民族以戰勝者之姿對臺灣進行的統治，這和他在鼓吹革命時力倡的排滿思想是互相抵觸。這種矛盾，正是當下知識分子在歷經政權交替的動蕩時，無法直言表達的苦悶。所以像李逸濤這樣的知識分子，僅能藉由對時事語彙的闡述或想像，在悽惶悲淒的時代變局中尋覓一個暫時性的精神寄託，「革命」就這樣成為他所推崇的精神口號，和賴以維繫個人積極、樂觀並追求進步、改革的良方。這也說明為何「革命」會頻繁地出現在他所撰寫的小說或評論中，成為李氏文學創作和思想啟發上的一大特色。

四、結論

本文以日治初期為時間範圍，探討臺灣文人李逸濤對於此時革命思潮的接受，與其對革命的觀點。透過史料的爬梳，可以發現，日治初期的臺灣，雖然不時地發生零星抗日行動，但相較於革命紛起的中國，臺灣算是較為安定的地方。但臺灣並沒有因為統治者的不同，而與外界的革命思潮隔絕。在日本統治下，臺灣反而成為革命人士如孫中山、陳少白和章太炎等人避難，或是尋求支援的地方，也因此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特別是本文所討論的記者李逸濤，能夠藉著職務之便，與他們結識，而這些人物也幫助李逸濤認識到中國為什麼要革命，李氏也因此成為革命的支持者，並在相關的文字中批判滿清政府的腐敗，以及力陳排滿運動，發揮以漢族為本的思想，這些都和中國當時的革命團體目標一致。

但李氏對「革命」一詞本身的運用和解釋，卻較孫中山和章太炎不同，孫中山和章太炎皆對於「革命」一詞的運用有所保留，但李氏

卻在傳統中國與日本文化的影響下，所運用的「革命」較接近於日本的思考方向，也比較符合西方對於「革命」的解釋。「革命」之外，李氏對於其他例如「立憲」或是「保皇」等亦有所認識，雖然沒有像「革命」一樣給予高度支持，但也沒有過於偏激的言論批判。對於身處在殖民初期的李逸濤而言，必須要面對的是「中國」與「日本」兩個國族認同上的矛盾，李氏雖然重視種族問題，但主要仍是針對滿人，並沒有因此暗地攻擊大和民族的殖民統治，在憂心中國的積弱不振，「恨鐵不成鋼」的心態下，李氏對日本文化和殖民統治頗有讚許之意，於是藉此和殖民政府擁有對話的空間，成為時代潮流下明哲保身的代表人物。

徵引書目

《民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新報》

[美] 史扶鄰 (Harold Z. Schiffrin) 著，邱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

[英] 巴特·摩爾-吉爾伯特 (Bart Moore-Gilbert) 著，彭淮棟譯：《後殖民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日] 池田敬正著，朱元等譯：《日本明治維新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7年。

[日]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年。

王 樾：〈章太炎的儒俠觀及其歷史意義〉，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69-282。

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林以衡：《日治時期臺灣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語言及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阿 英：《晚清小說史》，臺北：天宇出版社，1988年。

秦孝儀：《國民革命與臺灣》，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年。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 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 章炳麟：《太炎文錄》別錄卷一，臺北：新陸書局，1970年。
- 章炳麟：《檢論》，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章炳麟：《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
- 郭漢民：《晚清社會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陳建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235-260。
- 陳儀蓉：《晚清革命黨人的尚俠精神與實踐》，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 陳鵬仁譯：《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臺北：水牛出版社，1990年。
- 黃文儀主編：《牛津當代大辭典》，臺北：旺文社，1988年。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1-32。
- 黃玉齋：〈章太炎與本市操觚界〉，《臺北文物》第5卷第4期，1957年6月30日，頁43。
- 楊聯芬：〈女性與革命——以1927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政大中文學報》第8期，2007年12月，頁121-150。
- 蔣子駿：《國民革命與臺灣之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鄭淑蓮：《國民革命與臺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